

# 日治時期顏、施兩家服飾特徵及其意涵

：以施素筠的生命史為例

葉立誠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助理教授兼出版組主任

## 摘要

本次研究主要是以施素筠老師作為核心，並就其個人所衍生出來的鹿港施家（本家）以及基隆顏家（夫家），就該兩大家族成員在服飾穿著的現象與意涵進行探討。本研究是以口述歷史的方法與精神，執行施老師生命史的研究，口述專訪是起自1999年2月，至2002年2月為止，共進行有74次之多。經由深度訪談的過程，除了獲得可貴的口述資料外，在訪談過程中，更取得由施老師所提供珍藏的家族照片，這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在施老師的協助下，由研究者以多重交叉比對方式，精準確認出時間、背景、人物等相關資訊。

本次研究是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所進行的質性研究，其具體成果有三：一、本次研究嘗試以施素筠個人生命史的口述歷史，來進行有關臺灣服裝歷史與文化的研究，確實為此領域開拓出新的研究方向。二、本研究藉由施素筠親身經驗的口述，並搭配大量傳世照片的解說，再加上研究者的考證，確實有效呈現顏、施兩大家族成員，在日治時期服飾穿著上的真實樣貌，並且更進一步探究出穿著現象背後的意涵之所在。三、本研究嘗試以施素筠個人生命史為核心，以施素筠為例，深入瞭解施素筠個人，在一般穿著與學生制服兩類的穿著現象、態度、價值與看法，此確實能為臺灣服裝的深化研究建立新思維。

關鍵詞：日治時期、基隆顏家、鹿港施家、生命史研究、口述歷史、臺灣服飾

## 壹、緒論

### 一、研究動機

研究者個人開始接觸有關臺灣服飾的研究是始於1989年，其起因是因為當時協助恩師林成子教授，進行由內政部所委託的「臺灣地區民俗調查---服飾篇」之研究，在該次的研究過程中，不僅讓研究者體認到「臺灣傳統服裝」的意義之所在，也啟發了研究者個人，決定以「臺灣服裝歷史與文化」，作為個人學術研究的職志，而這段緣起一結到今年（2011年），不知不覺已過了有20多年之久。在這20多年的種種經歷，研究者個人積極致力於對臺灣服裝專業知能的養成，但在此同時，研究者也不斷反覆思考，如何能更精準地為臺灣服飾歷史與文化，建立起正確的風貌。因為，過往個人或其他研究者，在進行有關臺灣服裝歷史文化的研究，大凡都是透過史料文獻、傳世老照片，或實體文物的方式，藉此為臺灣服飾的概念建構出真相，雖然這些模式確實有效呈現出一些樣貌，但若更仔細的檢驗，則會發現，其實仍有許多欠缺與不足之處，例如：學術研究開發無顯著的突破；雖有廣度的鋪陳但缺乏深度的探究；經常出現以偏概全的問題；在研究方法的操作與運用上，拓展性與嚴謹性也都有待加強。舉一例而言，在臺灣服飾的研究中，經常出現運用傳世老照片，以此來作為建立臺灣服飾樣貌的基礎，雖然這個方式有其可取之處，但若是所分析的傳世老照片，在相關背景資訊條件不足時，再加上研究者以個人一己之見，倉促進行推論，那就很容易出現失真的現象。

經由上述所言，這也讓研究者開始深思，是否還有其他的研究法則，可供作為臺灣服裝歷史文化研究採取的方式？尤其是否能以生命史研究的思維，透過口述歷史的方式，來精進來臺灣服裝的研究呢？因為，誠如Denzin（1989年）與Becker（1970年）等人所言，他們對於以生命史作為研究的優點，認為有五項共同的想法：

（一）從個人的經驗中有助於瞭解生活中的一些實際活動。

日治時期顏、施兩家服飾特徵及其意涵：以施素筠的生命史為例

(二) 使用生命史研究能讓研究對象談論其生命歷程與經驗，提供豐富的資料。而且生命史研究能更細密呈現出個人在行為上實際的經驗與想法。

(三) 研究者能由其中發掘異於以往的想法，對於以往的想法能有所修正，並且發展出新的問題，能夠發現更多的可能性與觀點。另外，也能對既有的解釋、架構或者理論，重新檢視，以補足未提及或者是過於簡略的概念。

(四) 生命史研究也能提供過程性的資料。歷程中的經驗與知覺並非互不關聯，而是環環相扣的。生命史研究能讓人充分表達自我，當個人在敘說這些歷程、感受與看法時，藉由研究者的引導，能對事件的原因、個人行動的原因、整體情況變遷的原因等等的問題進行分析，獲得更多個人的分析，十分有助於探索真正的影響因素。而由於生命史研究能呈現個人的社會記憶與社會文化脈絡的連結，減少主觀感受與客觀世界的距離。

(五) 生命史研究能幫助研究者，瞭解個人如何感受結構加諸於其上的影響，包括個人如何解釋，如何因應其轉變，進而找出結構性的影響因素。在生命史研究中，與研究對象分享其經驗，讓學術研究更具人性化。

至於以口述歷史作為生命史研究主要方法的優點，根據國內學者許雪姬所言，她認為：「口述歷史是記錄過去保存史料的重要手段。」

(許雪姬，2004：6)；「口述歷史既是一種參考資料也是歷史本身，其優點在於容易引人入勝，又能創造史料，揭示新的問題面向以彌補文字資料的不足。雖然口述歷史帶有相當的主觀性，甚至是偏見，容易引起糾紛，但口述歷史卻能挖掘隱藏的重要問題，一經發掘，也將出現許多新觀念的產出。」(許雪姬，2004：1)；「口述歷史應該成為研究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料，它本身既是史料，也是歷史本身。因為至少是受訪者自己詮釋他自己的一生，所以不應該只被當成史料，應該被當成歷史的本身，而詮釋是他自己詮釋，雖然他的詮釋不一定跟後來史家去詮釋他這個人是一致的，可是畢竟是他自己詮釋自己一個非常重要的

證據。」（許雪姬，2005：17）。

所以說，以口述歷史作為方法來進行生命史研究，相信應該能對於現有臺灣服飾學術研究所存在的「研究題材開發性的不足、研究深度性的不足、研究資料完整性與精準性的不足、研究方法拓展性與運用性的不足」等問題，提供一個新的思維方向。

不過，要進行生命史的口述歷史，並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面臨最重要的挑戰，也是最困難的步驟，那就是如何選擇一位最適合的人選。因為這位人選必須具備多項條件：其一是，這個人選必須是耆老，而且他確實經歷所要探討的時代。其二是，這個人選其個人或所衍生的周邊人物要有可探究性。其三是，這個人選對於所探討的問題，要具有相當好的專業知識，能清楚辨別與表達。其四是，這個人選意識、思緒、記憶要相當好。其五是，這個人選必須能提供相關佐證輔助資料。其六是，這個人選要與研究者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其七是，這個人選對於參與受訪與研究意願要強、主動性要高。

對於研究者而言，想要找尋一位符合上述每一項條件，以生命史的口述歷史方式，來進行有關臺灣服飾歷史文化的研究，可以說是相當困難。所幸，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素有服裝國寶之稱的施素筠老師（現任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客座教授），當時還任教於實踐大學臺北校區服裝設計學系時，有一天與研究者相互寒暄，施老師隨口提及，她最近協助中央研究院進行基隆顏家的訪問。而研究者也向施老師告知，最近想要透過口述歷史進行臺灣服飾相關議題的研究，但苦無適當的人選，沒想到施老師主動提出，她很想出版個人自傳，而且手邊還有相當多珍藏的老照片，可搭配進行研究，問研究者是否願意協助，研究者喜出望外，便開始展開本次研究的籌劃與進行。

說起施老師，可以說正好符合前述七項條件的最佳人選，其原因有以下七點說明：

其一是，這個人選必須是耆老，而且他確實經歷要探討的時代。施老師從1923年出生之後，便親身經歷、見證臺灣。

其二是，這個人選其個人或所衍生的周邊人物要有可探究性。施老

師在國內服裝教育被譽為是國寶，她從事服飾教育相當長，剛好見證臺灣服飾教育發展。施老師出生鹿港望族，該家族與辜家有密切往來。另外，在臺灣史上素有「炭王金霸」之稱的基隆顏氏家族（也就是以金、煤礦業發跡，是臺灣礦業史上第一大家族的顏家）正是她的夫家，施老師就是嫁給基隆富商顏國年三公子顏滄濤先生。

基隆顏家與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合稱臺灣五大家族，是研究臺灣史中不可不知的歷史，而基隆顏家也與臺灣多位名人交織出姻親的關係。例如臺灣重要女畫家張李德和、臺灣醫界名人魏火曜、臺灣法律界名人陳逸松等人。

其三是，這個人選對於所探討的問題，要具有相當好的專業知識，能清楚辨別與表達。施老師與研究者曾在1989年一同協助林成子教授，進行「臺灣地區民俗調查---服飾篇」的研究調查工作，在該項研究中，施素筠老師負責閩南服飾的部分，與研究者曾一同實際在鹿港、彰化等地進行田野調查。另外，施老師在服飾專業知識相當豐富，曾編撰過服飾辭典，對於研究者想要探討當時臺灣民眾服飾的穿著，剛好有相當大的幫助。

其四是，這個人選的意識、思緒、記憶要相當好。施老師除了身體好，記憶力也是超強，可說是耳聰目明。施老師平日更有寫日記習慣，她個人曾出版多本服飾專書，並且以簡易裁剪通過發明專利。

其五是，這個人選必須能提供相關佐證輔助資料。施老師其個人與家族，珍藏許多珍貴的傳世照片，這也成為本次研究中最大的一項資源。

其六是，這個人選要與研究者有良好的互動關係。施老師是研究者母親在就讀靜修女中時的老師。她也教過研究者，後來與研究者在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成為同事，辦公桌緊鄰隔壁，與研究者關係相當良好，有深厚的師生、同事之誼，並且深受她的信賴。

其七是，這個人選對於參與受訪與研究意願要強、主動性要高。施老師剛好正想要籌劃出版個人自傳，先前她也曾接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訪問，對於以她個人生命史作為核心的研究，施老師意願相當高，甚

至主動要求研究者盡快給予協助。

歸納上述所言，施老師各項條件都相當吻合本次研究所需，其確實有助於本研究的執行。

##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次研究特別選定以施老師作為生命史的核心人物，透過口述歷史深度訪談的方式，以及施老師提供個人及家族珍藏老照片內容的說明與解釋，期望能探究出顏、施家族成員的穿著現象與意涵。針對本次研究的具體研究目的，詳見如下所示：

（一）藉由本次以生命史的口述歷史研究，期能為臺灣服裝歷史與文化之相關議題的研究，開拓出新的研究方向，並且能呈現出具體的成果。

（二）藉由本次施素筠所提供的個口述及家族珍藏的傳世老照片，期能精準地勾勒出日治時期顏、施兩大家族成員服飾穿著的現象與意涵之所在。

（三）藉由以施素筠個人生命史為核心，以施素筠老師為例，能深入瞭解施素筠個人，在一般穿著與學生制服的穿著現象、態度、價值與看法，以為臺灣服裝深化的研究建立新思維。

## 三、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擬提出以下四個主要問題：

（一）以生命史的口述歷史研究作為研究方式，能否為臺灣服裝史相關議題的研究，開拓出新的研究方向？

（二）藉由本次施素筠所提供的口述及家族珍藏的傳世照片，是否能呈現出日治時期，鹿港施家家族成員服飾穿著的現象與意涵之所在？

（三）藉由本次施素筠所提供的口述及家族珍藏的傳世照片，是否能呈現出日治時期，基隆顏家家族成員服飾穿著的現象與意涵之所在？

（四）藉由本次施素筠所提供的口述及家族珍藏的傳世照片，是否能深入瞭解施素筠個人，在一般穿著與學生制服的穿著現象、態度、價值與看法。

#### 四、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是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文獻資料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為主，透過個人生命經驗的過程，所進行的研究。

由於生命史是根據對話或訪談的結果進行記錄，亦即生命史主要以訪談或對話來建構生命，並將生命故事置於歷史脈絡之中。所以本研究雖以訪談施素筠老師單一對象的生命史為主，就其個人經驗的事實及對生活世界的詮釋加以表述之外，另外還納入傳世老照片的輔助，並且擴大個體周邊熟知的親友，即涵蓋受訪者施老師周邊相當熟悉的顏、施兩大家族成員，期能更周全的瞭解個人或團體生命。

本研究從1999年起至2002年，實施施老師個別面對面深度訪談，訪談時間長達三年，面對面固定式的實際訪談次數共計74次。每次訪談均以錄音與錄影方式同步進行，進行時也安排一位助理協助。

#### 五、研究範圍

本次研究是以施老師為核心，並就其個人生命歷程的實際經歷，和她個人生命史中所衍生出來的親人，其包括施家（本家）與顏家（夫家）兩家族的親友，就施老師所瞭解的內容進行陳述。

本次研究所建構的內容，除了以施老師的陳述為主要資料來源，並輔以施老師，陸續提供有關日治時期的傳世老照片，經過研究者再三仔細考證下，在時間、背景、人物、關係等內容，都有相當的明確性。這些珍貴的傳世老照片，每一張在時間的考證上，研究者都花費相當長的時間進行考證，力求每張照片在時間上必須是精準無疑，至於每一張照片的「內容說明」與「服裝特色」，都是由施老師一一親自口述說明和解釋，經研究者整理後，請施老師過目確認，若有訛誤之處則再做修正，而修正後再請施老師過目確認。當每一張照片都確認無疑後，再將所有的照片進行分類與編碼。

#### 六、研究限制

在生命史研究方法所造成的限制方面，包括推論性的限制、不能蒐集到完整的資料、研究資料的真實性、以及因果關係不強的限制等等。

針對這些限制，本研究也盡可能提出解決之道，以降低研究限制對本研究價值的影響。

另外，本次研究所針對的顏、施家族成員，僅就施老師口述中的人物為主，未含及所有的家族成員。

## 貳、施家成員服飾穿著的現象與意涵

1923年出生於彰化鹿港的施老師，七歲以前的童年生活都是在鹿港的老家度過，她一直要到1929年，由於父親受聘到辜顯榮二兒子所創立的大和製冰株式會社，擔任總經理一職，才與父母親離開鹿港老家，舉家北上搬到臺北後火車站附近定居，成為獨立門戶的小家庭。其實，施素筠老師對於鹿港老家的印象是相當深刻的，她能相當清楚回憶並陳述小時在鹿港的生活點滴，以及家中的一些情況：

我小時住在鹿港的房子是位在九曲巷（古名九間厝）的住宅，正門進來有寬敞的大廳，大廳沒有擺設太多的家具，大廳正面有祖先的公媽案桌，兩邊各有一張太師椅，通風很好，房子很大、房間也很多。小時候一群小朋友經常到半樓層上去探險，大人看到會叫我們下來，進去就有天井，左邊有走廊和第二落連著。5、6月天氣好時，記得祖母或伯母，她們會搬古衣箱拿衣服出來曬，也瞧見一些平日她們很少穿的禮服，她們看到衣服就會說出該件衣服是何時穿的，還順便說出當時狀況的一些點滴，看她們會尊重每件衣服與穿時的狀態，心裡滿感動的。

我們施家在鹿港當地是屬於大家族。父親在家排行老么，出生於鹿甘泉酒廠，他出生時日本已統治臺灣有六年了，家族所經營的是酒的生意，據說生意很好，但是日本人來以後，煙、酒改為國家經營，私人是不能經營的，祖父很氣憤也很不甘心，於是就結束酒的生意，改買地當起地主，

他是大地主擁有很多土地，多數的土地都租出去。

祖母在世時，父親兄弟三家同住在一起，我在7歲左右時到臺北，所以7歲以前的生活記憶，大多是鹿港的生活，當時祖父已不在世，一家22口為一家人，成員有：大伯家3男3女，扣掉大姐出嫁，共7人；二伯家5男2女共9人；我家1男2女共5人；再加上祖母一人共計22人。除了家人之外還有佣人，各一房都有一個「查某嫻仔」（女傭）。

在我讀幼稚園時，每天從九曲巷走到外婆家，帶著表弟（小我幾個月的陳哲）到鹿港第一公學校附屬鹿港幼稚園。過了一條長長的街頭，沿路兩邊是店舖，地上鋪的石頭路。外婆家在鹿港媽祖廟附近，我常到外婆家，五姨大我5歲，由於我家距離學校很近，所以她經常到我家來玩，小時外婆家還沒有電燈，用燈油的燈火來照明，走到哪個房間都要提著油燈。鹿港女人平均壽命都很長，外曾祖母和外婆都活到85歲。外公他是位讀書人，家裡算得上是書香門第，他在16歲時還考上秀才，後來在馬鳴山教私塾。

小時鹿港與臺北，生活機能不但大不同，生活條件也不一樣，當時雖然臺灣還沒有沖水馬桶，可是臺北的衛生管理就較鹿港嚴格許多。小時候在鹿港是沒有自來水，家人僅靠井水生活，當時家裡都是由佣人挑水給廚房用。

### 一、女性成員

施老師對於鹿港施家這個家族的印象，最令她深刻的就是相當保守，這種保守的觀念，也著實反應在鹿港家族成員的生活中，尤其是加重在女性成員身上。舉凡如：禮節相當繁瑣、做人做事都要小心、處處要謹慎、不能有任何差錯。例如她說：

小時候在鹿港吃飯時很熱鬧，但分兩輪，第一輪由男生大人先吃，母親們則在旁餵小孩吃，第二輪才輪到女人和小孩，吃東西時母親們會幫小孩拿菜，一切按規矩行事。家族

中的母親們，不能只照顧自己孩子，也要關心別人的小孩，否則會被講閒話。

我看家族的母親們，在談吐與做事上都很有分寸，她們的謹慎與小心都是被磨練出來的。

我從小就會留意觀察母親的行為，盡量照她所做的行為來行動，說話時也不敢想講什麼就講什麼，而是要看場合，因為我知道有些話是不可以隨便說，大人使一個眼神，我們小孩也就知道事情嚴重性的程度。

鹿港的大家族，禮節很多，有一大堆規矩要遵守，尤其是女性長輩每一件事都要小心翼翼，小時候我覺得好煩，心裡一直質疑大人為何要定這麼多的規矩？

由於家族在生活作息思維的保守觀念，這也直接影響到家族成員在穿著上的態度。所以，施老師對於小時候鹿港時期穿著印象最深刻，那就是長輩對穿著觀念的保守，以及要求也很多，而且她認為這種傳統的價值觀，在鹿港還被保留相當長的時間，她特別回憶並說到：

在鹿港時期（尤其是在1920年代），我看到家族的女性長輩們，穿衣都相當保守，大多是以中式服為主，對西式洋裝服飾接受度是相當的低。

我曾聽過母親告訴我施家的觀念是很保守的，尤其是對穿著的要求更是特別多，也特別在意。母親曾告訴我，以前女生小時候上學是要穿白鞋，但祖母說白鞋是戴孝、不吉利而禁止女生穿白鞋，所以每次女生放學回家，都必須在門外換鞋，有次有人忘了換鞋，直接穿白鞋踏進門內，結果被祖母看到，狠狠遭到責備。

在我小時候鹿港當時有很多人打赤腳，但家族的女性長輩都要求我一定要穿鞋，如果我打赤腳一定會被長輩罵，因為長輩認為那是很不得體、沒有家教，不符合我們大家族的規矩。

在鹿港家族裡一些穿著上的傳統、保守觀念，一直被保留，甚至到了光復之後還是一樣，觀念還是沒什麼改。

施老師深深覺得，穿著是深受一個地區，以及家族和家庭教育的影響所致。她深刻體會到，在鹿港傳統的大家族裡，女性穿著一定要保守、遵守傳統、個人形象不能太過招搖。施老師認為最能代表施家傳統、保守、守舊的概念，就是女性的纏足，有關纏足一事，施老師回憶幼年的鹿港時代：

在鹿港家境較好的女性大人多數都有纏小腳，我的祖母、大姑母、大伯母都有纏小腳，腳大部分都被褲管或裙子所蓋住，坐下來時才露出三寸金蓮的小腳鞋。

兩位伯母是不洗衣挑水的，因為她們都纏小腳，小腳是不能弄溼的。

其實不僅祖母纏足，伯母、姑媽她們也都纏腳，有時候我看到她們在天井（中庭），二、三個人換纏腳的布（腳白），看到她們的腳趾都變形，覺得很好奇，我也會問這問那，母親都會講給我聽。有一次我就問母親她和我為何就沒有纏腳？母親她告訴我，因為日本來了以後他們不喜歡臺灣人纏腳，另外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臺灣人的思想變得更自由了，受到西方流行的影響，所以女生就沒有再被要求要纏腳。

母親也曾告訴我，大姑母與大伯母們她們其實一定也都不喜歡纏腳，會纏腳是出於無奈，走起路來真的很不方便，她們都羨慕我母親沒有纏腳，悔恨生在那個年代。

過去在鹿港很久才洗一次頭髮，洗頭算是大工程，當時沒有自來水必須挑井水，用稻草燒水的準備，纏足的女性在不平坦的廚房地面上，用木桶挑水提水，洗後倒水等，井旁的地磚，有青苔石頭等，看她們洗頭髮還真是一件麻煩的事。

在昭和初年，我看到老人家小腳不再像過去只穿中式繡

花鞋，也開始穿著皮鞋，這種皮鞋可以訂做，我記憶中有人從臺北送祖母一雙黑皮鞋，之後她就一直穿這種黑皮鞋。

另外，施老師也提到，鹿港大家庭女性的穿著，雖然很保守，但卻很重視面子，要整理好才會出門，女人不敢隨便出去外頭亂跑，女人對於穿著很細心、注意，這也讓我們瞭解施家女性服飾穿著，除了「講求保守」之外，那就是「為了美觀」，以及為了「重視面子」。施老師她也說道：

我經常觀察女性長輩們，想知道到底她們每天都在做什麼。我發現家裡的女性長輩們，起床之後就一直坐在化妝臺前，而且一坐就是老半天，她們一定要打理個老半天才肯出門房。我看她們都是把頭梳理整齊之後，露出滿意的表情，才出走出房門。

在鹿港看到的老人家髮型一律是往後梳上去，在後面還有髮髻，有的高一點，有的較低，髮髻編法各有不同，我發現要向後梳髮時，前面的先固定在頂上，兩邊的梳理在後面之後，再放下去合在一起，編髮髻時會將髮毛沾黏在一起，使頭髮成一束在一起。整個梳整過程相當費工，所以上午梳了頭又綁了腳，就要花1、2個多小時，花這麼多時間的時間，其實都是為了愛美和愛面子。

年長的女性額頭上會戴眉勒，眉勒中央釘上金或玉的飾品，即使在家裡也整天戴著。頭上都插簪針，有的人每天插玉蘭花，因為頭髮不常洗，經常有油脂味。老年人很重視飾品的配戴，都有戴金戒子，而且耳環都是每天戴著，不會拿下來。項鍊是金鍊子，洗澡時有拿下來。還有人會戴珍珠項鍊。這些裝扮的打理，也都是為了愛美與愛面子。

有關鹿港施家女性服飾的穿著現象與態度，長輩們與年輕一輩是有差別的，施老師的祖母（施林引）、伯母（大伯母施陳賢、二伯母施黃過）、姑母們的這些長輩，在日治時期都是一成不變，維持單一款式

的中式服飾穿著打扮，甚至連1930年代較時髦的中式旗袍，也不曾穿著。然而年輕一輩的施家女性成員（如堂姐們），在日治時期小時雖以中式服為主，但在進入學校就讀之後，就轉而接受日式制服，成年之後的服飾穿著，則以中式旗袍與西式服為主，此顯示成長時代的差異與轉變，會具體影響穿著的態度與價值觀。至於針對日式和服，除了施老師與妹妹之外，在鹿港的施家女性則接受度就相對的極低，就上述的看法，施老師她曾提到：

我記得在日治時期，鹿港家裡的女性長輩們，長期以來都是穿中式的衣服，款式變化不大，材質以棉質的較多，衣長大概到放下手的手指尖長。祖母老人家都穿黑衣服，大約50歲就算老了，衫與褲的搭配較多，長褲都是全長的大筒型，遇有過節日或客人來的時候，祖母、伯母、姑母們，她們才會穿上長裙。外出時她們也會穿長衫，長衫被視為是禮服的一種。祖母始終穿中式長衫，長衫有時是緹花、有時候是黑絲絨，這些都是從大陸來的布料。我最喜歡依偎在祖母身邊，摸衣服的材料，感覺好舒服、好輕柔，後來才知道這是絲綢。

在日治時期，我記得鹿港家裡的女性長輩們，尤其是祖母、姑母與伯母們等人，她們都是穿中式的衣服，款式也都一成不變。她們一生未曾穿過後來流行的旗袍，更未曾穿過西式服與和服。

在鹿港老家，我看到當時大人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在家裡做，或拿去裁縫店訂做。我記得祖母、伯母、姑母女性長輩們，冬天穿的是軟料材質的長褲、長裙和中式大袍衫。夏天上衣是淡色麻質的中式衣，褲子則是以黑色為主的長褲。年輕女性會穿有花布的衫褲。從布料最能看出是屬於年輕女性穿的，還是屬於年長女性穿的。

與我同輩的鹿港施家女性，穿著就比較跟得上時代，堂姐們成年之後也都接受西式服的穿著與打扮，不論中式旗袍

或是西式洋裝都有看到她們在穿，其中最愛漂亮就屬二堂姐，在1930年代她還去燙個時髦的頭髮。不過對於和服而言，在鹿港施家不論是年長的女性長輩，或是年輕的同輩，都沒有看過她們穿過和服。

## 二、母親個人

施老師深刻感受她母親的個性是相當保守拘謹的，而這種個性也直接影響她的穿著態度。施老師認為母親的保守拘謹個性，一定是在施家被大家族磨練出來的，但在施家讓她養成一生嚴守女性規範的價值觀，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施老師的母親，在1929年從鹿港轉居到時髦的臺北，雖然偶爾穿西式服、和服，但最常穿著的還是中式服（特別是袍），髮型式樣也是一層不變。對於母親與穿著的印象，施老師特別提到。：

母親陳月嬌18歲時嫁給父親，翌年產下我。我母親她是1907年出生的，沒有纏足，而且有上學校，所以穿的是較年輕的服裝，如穿旗袍、裙子、上衣之類的服飾。母親在鹿港時穿著主要是以中式衫裙為主，父親也會從臺北買布料給母親，這些布料在當時算是很時髦的，這些料子母親也將它做成中式的服裝。另外，我記得母親有一件長背心，和長衫一樣長，也有開叉的旗袍，聽說是從上海流行進來的。

我記得在1930年代後期，父親還買一件皮草大衣送給母親，母親很珍惜只有偶爾外出才會穿，穿的次數相當少，把它當成是寶貝。而有趣的是，母親在穿這件皮草大衣時，裡面穿的還是中式旗袍。

祖母不斷告誡我母親，不任性、不自大、多做事、少講話；不要批評別人穿著，自己穿著要保守，這樣才不會讓人講閒話；尤其要注意女人千萬不要在大家面前太愛表現，這樣容易讓人討厭。

小時候我經常在想，大概是母親待在大家族裡生活過得

太緊張的緣故吧，這也就是為何她的胃一直不好的原因。母親的保守，是受到鹿港時期的影響，而且這些也都直接反應在她的服裝穿著與打扮。

1929年之後，我們搬到臺北定居，生活就完全自由了，在臺北家裡，除母親一人之外，所有人都習慣穿洋服，家裡就只有母親一個人很保守，她一輩子梳中式髮型，穿旗袍。

在臺北的生活較過去鹿港時自由許多，而且我看到在臺北一般人都是習慣穿西式服，母親剛開始也改穿洋服，但髮型仍維持中式髮型，後來過了一些時日，她覺得中式髮型與洋裝不搭，所以又轉回以中式服為主。她一輩子都梳中式髮型，這種現象似乎是受到居住在鹿港時期家族的影響所致。

母親頭髮都是束在後頭結髮，她每天弄頭髮、梳頭髮都要花不少的時間，上午都花在打扮一身就快到中午了。由於母親的髮型一直都維持一種樣式，改不過來，她覺得穿起洋裝很不搭，所以後半輩子大都以旗袍為主。

施老師的母親對於中華文化有相當大的熱情，這源自於施老師的外公，他曾考上秀才也教過私塾，是有直接的關連，施老師也記得母親曾非常熱衷參加漢學會，也許這就正好說明，因為施老師母親，她個人對漢民族文化有著相當強烈的信仰與情感，而這種信念，也就直接影響她服飾穿著的態度，對此施老師就曾說道：

母親從1930年代，就開始相當熱衷於漢文化的接觸，例如積極參加漢學會的一些活動、讀漢文。我想這除了是受到外公曾是秀才的家世影響之外，還有就是出於她個人的熱愛，她經常告訴我漢文化是很有深度的文化，不像現在流行時髦的東西，一下就消失，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她也曾說過她喜歡穿中式旗袍，因為旗袍穿起來給人看，就是那樣典雅、大方，而且很有文化。

「學習是否一定會影響到後續的行為（尤其是在穿著行為的表現

上)？」我們從施老師的母親曾到「臺北洋裁研究所」一事，似乎看到一些有趣的現象。施老師曾就母親到「臺北洋裁研究所」學習洋裁提到：

我的母親及阿姨曾於我初二時，到「臺北洋裁研究所」學習洋裁，「臺北洋裁研究所」就是後來所稱的「登麗美安」。她之所以會去學是因為我一直叫她去，因為她都做一些我不愛穿的中式衣服，我希望她能做一些時髦的洋服給我穿。母親大概是受到課程裡學習到流行趨勢的影響吧？感覺她的心情突然開明許多，學完後母親真的也為家人做洋服，我跟妹妹都很高興。至於她還是習慣穿她的中式旗袍。

至於針對施老師母親穿和服一事，施老師說母親雖然也有穿，尤其是在皇民化時期，其實施老師的母親並不喜歡，她會穿也是出於不得已，因為她必須參加愛國婦女會。這種「內在情緒」與「穿著行為」，彼此之間充滿矛盾的糾葛。在皇民化時期，施素筠老師母親還是以旗袍為主，此也呼應當時女性，尤其是中年以上婦女還一直保留傳統穿著，而無意改變事實。就此一事施老師特別說道：

在皇民化時期，母親之所以穿著和服是相當無奈的，因為她必須參加愛國婦女會，參加時礙於規定所以只好穿，回到家她就趕快把和服脫掉。

在皇民化時期，母親其實平日她是不穿和服，也不穿改良服的，還是以旗袍為主。因為她覺得自己又不是日本人，而且穿和服也不方便。我笑她有中國情節，她也欣然接受。

### 三、父親與伯父

施老師父親從小生長在一個物質不匱乏的優渥家庭裡，另外再加上，他又是家中排行是最小的男孩，所以特別深得父母長輩的疼愛與縱容，可說是「要什麼有什麼」的被寵愛。除了有外在條件，施老師父親本身個性也相當的海派大方、交友甚廣、擅長於交際，尤其像是他與鹿

港大家族辜家的成員就有非常好的友誼。另外，他個性上還有一項特點，那就是對於流行的東西他非常喜愛的，是往往都走在留流行時代的前端，一切講究派頭，在當地還博得「阿哥頭」（公子哥、時髦哥）的封號。施老師父親穿著的態度，似乎說明臺灣一些家世好的子弟穿著的態度，是以追求流行時髦來建立個人的聲望。這就是為何施老師父親，雖然生長在一個保守拘謹的大家庭裡，但卻能突破保守的家風之原因。所以，當施老師父親的兄長們，都是穿著非常保守與守舊的中式服時，施老師的父親卻處處表現講究時髦的穿著打扮，如時髦款式的西式服、特別造型的髮型，而且穿著非常有個人的想法。對於父親部分，我們從施老師的陳述，可從中了解一些端倪：

我的父親名字叫施安，在家中他排行老么，大伯名字叫施時、二伯名字叫施富。父親他與二哥相差10歲，與大哥相差20歲，由於是老么，又與兄長的年齡差距較多，所以相當受到長輩的疼愛，物質條件相當優渥。

父親從小就像「阿舍」（公子哥兒），就是當時西方社會所稱的「DANDY」，所謂的「DANDY」，就是一身漂亮的打扮，不做事，且肯用錢救人布施的人，歐洲很流行這種風氣，父親就是這一類的人，鹿港也有這種人所組成的社團，父親經常參加慈善會、興學會，這些都是需要出資的，參加這些活動的人，他們穿著都很體面。

父親很重視時尚，追求流行，講求品味，聽說連內衣都是白色絲製，相當講究。

當時在鹿港一般男生都穿中式唐裝上衣和寬褲管的長褲，但是父親已經穿起很體面的西裝，很有派頭。

其實影響施老師父親追求流行的特質，還有一項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在中學時離鄉背景到臺北就讀工專，這讓他少了家人的約束，而且又有臺北都會時尚環境的影響，當然施老師父親有機會到海外擴展視野，也都是影響他的原因：

我父親追求時髦的性格，除了是因為家人疼愛之外，還有就是他在中學時到臺北唸書，他讀的學校就是後來所稱的臺北工專，臺北都會時尚的環境深深影響他，再加上他的個性使然，另外還有，就是他去過海外見識比較廣，這些種種因素，都促使他，相較於自己的兄長在穿著上，更顯時髦、也更顯西化。

父親到臺北念書是1916年左右，那時在臺北已經可以買到進口的法國貨。我記得母親使用的法國香水，也是父親從臺北買的。小時候父親也會經常從臺北帶回巧克力給大家吃，另外還有一種含酒味的糖果、瓶裝的生奶，也有進口的衣服和服飾品，後來到了臺北，對於這些進口貨就不再感到稀奇了。

記得父親每到大陸（北京、上海、廣東等地），都會為鹿港的兄嫂買杭州綢，她們那一件一件的衣服，都成了很有紀念性的衣服，當時絲綢的服裝都以棉布當裡布。

雖然說施老師父親穿著相當時髦、西化，但內心卻一直保有中華民族意識的觀念，故施老師特別提到：

父親在日治時代時期，雖然穿著打扮相當西化，但內心卻保有中華民族意識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父親經常告訴我的，他之所以送我去日本留學，所考量的是希望我能學習更先進的觀念，而非鼓勵我崇日，這也如同他穿和服但也並非是表示崇日的原因是一樣。

父親相當熱愛中華文化，固定到漢文的私塾學習漢語、他也經常聽京戲，雖然常穿體面講究的西裝，但也會穿中式服。

至於施老師父親的兩位兄長與她父親穿著的態度與認知就不一樣，施老師父親的兩位兄長，他們主要都是以中西合璧的穿著為主，他們的穿著模式，其實也是代表當時臺灣一般男士，穿著演變過程的一種現

象。施老師在談到父親與兩位兄長的差異時說道：

阿伯（伯父）他們雖然穿中式服，但帽子不戴中式碗型帽，而是戴西式的山高帽，成為中西合璧的組合，好多長輩都是這樣穿，小時候我剛開始看這種組合很奇特，不過看久了就習慣了。而我也曾聽到父親告訴母親說，他不喜歡像別人一樣「不中不西」混著的穿。

阿伯（伯父）他們對西式服，尤其是具流行的款式接受度很低，他們長期以來都是中式服穿著，或是中西合璧的組合穿法為主，這種穿著習慣，應該跟他們成長背景的時代，以及個性的保守，還有就是他們都是長期待在鹿港有直接的關連，他們不像父親一樣愛到處趴趴走，到海外、也到臺北，那樣見世廣闊。

### 參、顏家成員服飾穿著的現象與意涵

施老師是在1942年9月21日與顏國年三子顏滄濤結為連理。在此之前，施老師對顏家可說是一無所知，她是在結婚之後，才慢慢經由顏家親戚口中得知顏家一些事情。對於與先生成為夫妻的經過，施老師如數家珍說道：

1940年3月父親來東京來參加畢業典禮，並帶我回臺灣，在回臺灣之前坐船的前一天下午，有一位青年來拜訪父親，他的名字叫顏滄濤，我曾看過他的照片，他是臺北帝大理農科畢業的，他畢業之後到山口縣宇部市的宇部肥料會社研究室做技士。我倒茶出去之後就躲起來，從門縫中看他和父親談話，他看起來很老實，一臉書生樣，比照片溫和，當時我完全沒有和他交談。以前成年女子是不能單獨與男生自由交往，自從我進入第三高女以後，堂、表兄弟們就不再單獨往

來了，主要是怕給學校同學講閒話。

我與先生結果在雙方家人的同意之下定了這場婚事，就在父親的同意之後，對方家長就開始積極籌備婚事，沒有幾個月就訂婚了。結婚之後也才慢慢瞭解到顏家。

至於有關顏家成員的服飾穿著，施老師也曾向顏家成員（如丈夫顏滄濤、姑姑丁顏梅、嫂嫂張女英等人）詢問，瞭解他們在穿著上的態度、想法與意涵之所在。下面就依施老師所熟知的顏家成員，分述說明：

### 一、顏雲年

根據史料文獻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將基隆顏家家業與事業發揚光大的關鍵人物顏雲年，他針對當時社會及日本殖民政府，所相當關切的「斷髮剪辮、改穿漢服、解放纏足」，有非常明確的態度與看法。按其類別主要可分為「基隆剪辮會」與「天然足會」兩項最具代表。

（一）「基隆剪辮會」：明治42年（1909年）2月，大稻埕醫師黃玉階，首倡斷髮，鼓勵剪除辮髮，勸人更改為西洋式頭髮，則為「斷髮會」之成立。但推行以後歷經二年，臺灣之士庶，猶故國情深，輕易不言斷髮，去除以往通行之長辮，而所穿衣服亦仍採漢裝，寬襟闊褲是其尚。（唐羽，2003：387）統治者之日人，由是藉輿論，月旦譏評；甚至對於不從斷髮者，嚴詞評擊云：「故託其詞曰：可以心服帝國，不須以形骸服帝國，欲以撓人之進取心，其罪誠難逭也。」<sup>1</sup>其後，瀛社林湘沅、謝汝銓、魏清德等人乃提「斷髮不改裝」主張，為折中之新方案。事情傳布，士人亦認為「稍能接納」。<sup>2</sup>成立「斷髮會」於44年（1911年）2月，由是各地相繼仿倣。耕時顏雲年猶居於焯仔寮，卻於將迎農曆新年之一月末：「深感潮流之所趨，斷髮之舉，勢在不能免。」因先為三子欽賢、德潤、德修剪除辮髮，使迎新年。<sup>3</sup>次及4月3

1 《臺日報》明治44年2月3日，3844號，頁3〈反對斷髮者果何心〉。

2 同前註，明治44年2月9日，3850號，頁3〈臺北斷髮不改裝會員照片〉；2月16日，3856號，頁2〈發起人魏清德照片〉參閱。

3 《顏氏家乘》卷二十文徵〈陋園先生詩紀事編年註一〉頁987「謝汝銓社兄籌斷髮不改裝即步汝馨詞宗芳韻」詩。

日，偕同有志於基隆廳成立「基隆剪辮會」，許梓桑被推正會長，而雲年為副會長。<sup>4</sup>會既成立，瀛社社友葉汝馨時適在九份採金，因題一首為〈慶賀顏雲年、許梓桑君等斷髮大宴會〉云：「翩翩瀟灑集羣賢，半似上人半似仙，未得菩提參正果，早隨風氣晚塵緣；更新頭腦昭同化，重整衣冠異去年，露頂圓光真磊落，文明肇啟慶華筵。」<sup>5</sup>此一「斷髮會」未久即由諸幹事，推及廳下各庄（唐羽，2003：388）。

（二）「天然足會」：天然足會，通稱「天足會」。初日人據臺後數年，臺人以故國情深，內心仍不服於日人文化，對於所生女兒，仍沿習老祖宗之俗，凡年至五六歲，則強令纏足，以尖頭細足之俗稱「三寸金蓮」者為美。以致生為女子者身心受創痛（唐羽，2003：389）。明治33年（1900年）1月11日，黃玉階以身為醫師深知其害，而發起天然足會之組織，倡導改良此項陋習。是日乃於普願社舉行成立典禮，參加者250人；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均列席致詞勉勵。<sup>6</sup>組織訂立〈簡約四條〉，推行廢除纏足之弊。<sup>7</sup>會並置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次有幹事長、副幹事、顧問、評議員等，共襄改良善舉，顏雲年與許梓桑亦參加之，並列評議員，唯加入年代待考（唐羽，2003：390）。

顏雲年生於1874年，逝世於1923年2月9日，此年適巧為施老師出生的年份。雖然施老師未曾親眼目睹過她公公的二兄，但透過顏雲年的公子如顏欽賢、顏德潤及其他嫂嫂們和長輩們的陳述，也讓她瞭解到顏雲年穿著上的一些態度與意涵，而相當可貴的是，過往對於顏雲年有關「剪辮與放足」一事，我們只能從文獻的資料瞭解到一些端倪，至於一些實際的狀況則所知有限，此次從顏家家屬的角度，讓我們更瞭解顏雲年與「剪辮與放足」，實際的作為與關連。根據施老師的陳述：

我一直覺得顏家的人，在穿著上很西化也很日化，相當氣派、講究與先進，很有大家族的樣子。顏家人告訴我說公

4 《臺日報》明治44年4月5日，3902號，頁3〈斷髮準備彙戰〉。

5 同前註3，《家乘》頁988。

6 參見《臺灣省通志》卷首下〈大事紀〉光緒26年條。

7 同前註。

公（顏國年）的二兄（顏雲年），早年他還曾協助推動男士剪辮、女性放足，觀念很新，據了解他（顏雲年）的這些作為相當程度是為了表達對日本人的一種善意。他認為我們既然要跟日本人合作，一起在臺灣打拼，穿著儀態形象就不能差距太大，否則如何能平起平坐？尤其是男士在外工作、做生意，穿著形象一定要融入日本人的文化，否則就會被排斥，所以這就是為何他很早就為他的小孩剪掉辮子的原因。

公公（顏國年）的二兄（顏雲年）對於小孩的教育非常重視，而且是不分男生或女生都是一視同仁。他希望家族年輕的女性晚輩，在穿著上也要跟得上時代。他曾告訴顏家的女性家眷，穿著中式衣服沒關係，但不要纏腳，纏腳是落伍的象徵。

至於進一步針對於日本殖民政府初期執政時，就開始在意的「臺灣男士留辮子」一事，顏雲年對此的主張是支持「斷髮」，但是他是否也傾向要把漢服一起改掉呢？其實顏雲年他覺得是不需要，顏雲年所持的態度，經由施老師從顏家人告知瞭解：

他（顏雲年）在日本來臺之後，很快的就接受西式服，甚至隨後也開始穿起和服，但在此同時，他也會穿中式服的長袍馬褂。他經常說不會因為穿上和服時就覺得自己是日本人，自己一直都是中國人，血源是改變不了的。穿中式服也不表示就跟不上時代。

他（顏雲年）曾說過男生留根辮子就很不方便，跟纏腳一樣是落伍的象徵。然而穿著漢服則並不是有落伍的表現。

## 二、顏國年

在針對施老師公公顏國年的部分，顏國年在年少時的1900年代曾留過辮子，穿著以中式服為主，但從1910年代初開始不久，也呼應哥哥顏雲年的想法，把辮子剪掉，其主要原因是因為顏家開始在煤礦業與

日本人有更多的合作（例如，在1910年8月顏國年的兄長顏雲年與木村九太郎外等15人，擬組基隆輕軌，鋪軌道基隆與萬芳間），該家族為表對日本的友好，男性成員特別將辮子剪掉，以表示對日本正在臺灣推行剪辮的支持。在日治初期，一般男生在把辮髮剃掉之後，便開始逐漸的西化，如戴西式黑色毛質山高帽、穿皮鞋，但卻一身中式服，因而就出現中西合璧模式的穿著，這種組合穿法也曾出現在顏國年身上。顏國年在度過中西合璧穿著之後，就逐漸轉而以全盤西化為主，以日化為輔，對穿著也更重視要體面、講求時髦。施素筠老師對於公公顏國年的穿著，有如此的說明：

從1919年之後，公公就不再穿中式服，而改以西服及日式和服為主，自此之後，一直到晚年往生前都不曾再穿過中式服。公公個人相當重視服飾穿著，認為體面的穿著能表徵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在顏家的男性中他對穿著最考究，還曾到歐洲考察時帶回好幾大箱的西裝禮服、皮鞋、禮帽。

顏家服飾穿著西化的風潮，是從男裝先開始，相較於女裝的西化快了許多，而且時髦講究，公公顏國年就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一位。我知道公公顏國年曾赴海外考察，還特別在國外訂製許多套西服帶回臺灣。公公最津津樂道就是，他所費不貲訂製一整套大禮服，其中高筒型禮帽與燕尾服外套，這對當時日治時代的臺灣人而言，是相當稀有的。公公還特別穿著拍照留念。

從1910年代後期之後，公公已不再穿中式服，而改以西服及日式和服為主，他的穿著成為家族男性成員效法的楷模。

### 三、男性成員

除了顏雲年與顏國年兩位之外，針對顏家年輕一輩男性成員的服飾穿著，施老師也有相關的陳述，在顏滄海部分（也就是施老師先生的大哥）：

大哥顏滄海（施老師先生的大哥），他於就學期間都是以學生制服的穿著為主，學校畢業後開始以西服為主，偶爾會穿和服。髮型都一直維持西式中分造型的款式。對於穿著他認為西服能表現現代精神，並認為穿著中式臺灣衫則顯得保守與守舊，會跟不上時代，所以他不喜歡穿中式服。

大哥顏滄海，長相佳、家世好，又留學日本名校慶應大學，是臺灣年輕一輩菁英的代表，大哥的穿著相當西化，很體面也很講究，他們全家穿著都相當入時。

針對施老師自己先生顏滄濤，他的穿著就不如哥哥顏滄海那樣講究與體面，這似乎讓我們體會到同一家族的兄弟，穿著態度行為，還是會深受個人價值的影響，施老師她對先生顏滄濤穿著就提到：

先生顏滄濤，排行老三。他在就學期間都是以學生制服的穿著為主，對於穿著，他自認自己外貌長相平庸，不如大哥顏滄海長得體面，身體又較瘦弱，加上個性內向所致，所以對穿著打扮不挑剔，也不在乎，相當隨性，居家時經常汗衫、短褲、拖鞋，我為此還經常與他爭執。不過，還好他在重要場合還是會穿西裝打領帶，否則就太失禮了。

先生的頭髮很少整理，一直都很亂，我經常告訴他，可以向大哥看齊，但他並不為意。我經常想他們兄弟兩人為何有這麼大的差距，我想大概是個性使然吧。

#### 四、女性成員

對於顏家女性部分，施老師也曾向顏家成員（如丈夫顏滄濤、姑姑丁顏梅、嫂嫂張女英等人）詢問，並搭配傳世老照片，瞭解其中一些情形。其中特別就顏家家族女性成員，如顏雲年與顏國年兩位夫人、先生的大姐顏梅、大嫂顏張女英、二姑顏碧霞的穿著，施老師有較多的陳述。

顏雲年與顏國年兩位夫人都未纏足，這對臺灣早期閩籍大家族而言

是相當罕見的，這似乎呼應了顏雲年早年支持推動「天足會」的事實，將解放纏足落實於家族女性成員的事實。施老師曾說道：

顏家女性長輩最特別的，就是在那個時代裡她們都沒纏腳，這種情形在當時一般閩南家庭而言，是很特殊的。因為在早期一般家境環境稍好的閩籍女性都是要纏腳。

有關女性纏腳，顏家與施家在這方面觀念差距很大。顏家觀念很先進，施家觀念就比較保守。

至於在服飾穿著打扮上，顏家女性長輩的顏雲年與顏國年夫人，她們兩位都是終身穿中式服，款式變化也不大。

二伯母與婆婆她們一輩子穿傳統黑色中式服裝，由於婆婆經年都是著黑色中式服，因此我兒女就叫婆婆是「穿黑衣的祖母」，而稱我母親叫做「穿白衣的祖母」，以分辨兩位祖母。婆婆與我母親兩人年齡差了將近有一個世代。

至於顏家年輕一輩的女孩，在穿著觀念就顯得時髦許多，她們主要還是以洋裝及和服穿著為主，但也能接受具流行款式的中式服，其中在二次世界期間，顏家的媳婦與女兒輩最特殊的，就是還會穿上做工精緻的和服，這與其他臺灣民眾的穿著現象，確實形成相當大的差距。施老師就此說道：

由於二伯與公公在觀念上，對於小孩不論是男女，都認為應該接受好的教育，因此顏家年輕一輩的女孩大都接受很好的教育，正因為接受日式教育的薰陶，故她們想法也比較先進，穿著都以西式與日式為主。

顏家年輕一輩的女孩，由於家境優渥，穿著都很體面，追求時尚。

在日本文化推動下，有推薦鼓勵上流社會的人穿和服的情形，顏家成員尤其在日本友人來訪時，會特別穿上和服表達一種歡迎與尊重，讓日本人覺得和他們是同一國的。這種

情形甚至還延續到1940年代的戰爭時期，顏家的媳婦與女兒輩，都還會穿上做工精緻的和服，與日本友人聚會，而這種情形直到光復之後才告結束。在日治時期穿著和服，相當程度是一種優越感的表現，象徵一種社會地位，跟今天使用名牌的道理是一樣。

針對日治時代日本人在臺灣所進行的服飾的改變（或是改革），施老師及顏家的女性大致上都相當支持與認同，而這個看法相當不同於，同處該時代其他一些臺灣民眾的看法。我們從施老師的陳述可得到瞭解：

日本人對臺灣纏足的習俗非常不贊同，認為是非常殘忍而不人道，把「解放纏足、不纏足」當作是一項非常重點的施政方針來推行，對於這一點我和顏家年輕一輩的女性都很支持。

顏家為表示對日本政府政的友好，很早就率先支持「不纏足」，所以顏家女眷成員很早就「不纏足」。年輕一輩的女性更樂於接受，象徵時髦與進步的西式服。

我和顏家年輕一輩的女性都認為，日本人對臺灣上流社會的人士是以禮相待，並無欺詐壓制的行為，彼此是相互尊重的關係，臺灣上流社會人士的穿著，與日本人的穿著並無差別。我和顏家年輕一輩的女性都很喜歡穿著和服，很多人都說：「日本人來了，都是以欺壓的方式強迫臺灣人改變穿著，臺灣人對此都很排斥，並且抗拒」，針對這點我就相當不以為然。

對於顏家年輕一輩的女性，施老師就特別以其中的幾位為例，陳述她們在穿著上的實況。

顏梅（也就是施素筠老師的大姑），她在穿著上是相當時髦，是屬於那個時代的時尚名媛代表。施素筠老師特別提到她先生的大姐顏梅的一些記事：

大姑顏梅在少女時就赴日本留學，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她穿著打扮相當時髦，是顏家女性中最優雅的一位，她的形象猶如日本上流社會貴族小姐的風範，例如在她小時的1910年代，顏梅她就曾戴過歐洲製造的少女帽子，這在當時臺灣是相當罕見的。顏梅在她結婚時穿著來自歐洲的全套白紗禮服，同樣這在當時臺灣社會也是少見的。顏梅的穿著打扮可說都是走在時代流行的尖端。如果以今天的術語來說，就是「時尚名媛」。

顏梅在小時就到日本念小學，她之後考上東京府第一高女，她因為東京大地震返臺，改在臺北第一高女三年級念書，當時她就是以和服及洋裝為主，甚至平日也會穿著和服。

顏張女英（也就是施老師的大嫂），她的穿著同樣是以體面、時髦、講究著稱，對於大嫂顏張女英，施老師回憶並說道：

嫂嫂顏張女英，她的母親就是鼎鼎大名的張李德和，她是臺灣少數知名的女畫家，曾拜師臺灣知名畫家林玉山。大嫂思想很先進，對穿著相當時髦有個人的主見。

嫂嫂顏張女英雖然她來自中部的傳統家庭，但個性相當時髦，對於中式衫裙、日式和服、西式洋裝各種款式，樣樣都能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在1930年代她已穿起在當時相當稀有、昂貴的貂皮大衣。在髮型上，也於1930年代中期開始燙髮，這在當時是相當時髦的表現，甚至她為凸顯個人形象上的特色，還會在右邊額頭處燙出瀏海的造型。嫂嫂不僅個人重視穿著，對於家中小孩的穿著打扮也相當費心，是相當在乎全家人的穿著與儀態。另外，她也相當重視化妝，即便只是到庭院也要打扮一番。

顏碧霞（也就是施老師的二姑），她年輕時期的穿著相當時髦、重視品味，但從日本留學返國之後，她在穿著上就轉而變得比較樸素。施

老師特別提到二姑一些記事：

二姑顏碧霞（施素筠老師的二姑），她是魏火曜的夫人。二姑於基隆女中畢業之後便赴日求學，1934年自日本東京女子大學日文系畢業。她在日本念書時，學習到嚴謹的生活規範與自治訓練，而這也是她自認獲益最深的地方，學成返國之後，她在穿著上就比較樸素，變得低調不奢華，見人都是笑臉迎人，很有親和力。

#### 肆、施素筠個人服飾穿著的現象與意涵

就施老師個人本身而言，她在穿著上的現象與意涵，可依兩個部分來切入，其一是「一般穿著」，另一則是「學生制服」，以下分別論述。

##### 一、一般穿著

1929年施老師在就讀公學校時期，隨父母搬到臺北定居，之後就獨立門戶成為小家，生活相當不同於鹿港的時期，是完全得到自由，而這種自由的轉變，也同樣顯現在家人的穿著態度上，對施老師個人而言，環境深深影響她在穿著上價值，尤其是生活日化的顯著，更明顯有別於鹿港的時代。施老師舉家搬遷到臺北之後有一些相關的回憶：

我與父母親搬離鹿港老家的原因，是因為父親受聘，要北上到辜顯榮的二兒子所創立的大和製冰株式會社，擔任總經理一職。所以就與弟妹一家五口，一起舉家搬遷到臺北的後火車站附近，於是我便轉學到臺北蓬萊公學校就讀。

我家住在日本人的住宅區，家裡附近都是日本人，巷內經常有賣豆腐或魚的攤販前來叫賣。早餐的菜是用推車的方式叫賣，家裡喜歡買甜豆，種類有花豆、黑豆、豌豆、蠶

豆、白豆、黃豆等，樣樣都好吃，自己煮沒有那麼好吃，所以每天都等著要買。住家巷口有一家賣炸魚餅（天婦羅）下午3點才會出來賣，很新鮮也很美味。在家附近還有一些店鋪如賣生魚片的店、雜貨店、鴨肉店，都是賣日本人吃的較多，所以我在早期就習慣吃日式食品，在家也習慣穿日本下駄（木屐）、穿和服等等，不知不覺就日本化了。

臺北的風氣不同於鄉下，對流行接受度很高，我小時在臺北住家經常看到對面家的日本人的女孩，穿著很講究的衣服，相當羨慕，小學五年級時，父親有一天帶回我和妹妹的新和服，我們相當開心，在鹿港我就沒有看與她年齡相近的親人穿過和服。

我小時候在鹿港時穿的，是母親所做的寬袖（當時流行的）長衫，褲子和短衫之類的衣服，除此之外，還有就是父親從臺北買回來的洋服。小時候在鹿港當時沒有成衣可以買，過年過節都是穿母親做的新衣服。後來到臺北，母親也是照樣做衣服，小時候我會乖乖穿，但長大加上受臺北時髦風氣的影響，我就會像家人要求要選擇自己喜歡的款式來穿，而且會認為母親做的中式衣服很土，覺得不夠時髦，甚至要求母親去學洋裁。臺北環境對我的穿著態度，可以說影響相當深。

就施老師成長過程中，實際待過並目睹到鹿港與臺北兩個地方，她提到臺北與鹿港生活機能不但大不同，生活條件也不一樣。而服飾穿著的差別，表現在城鄉上的差異是非常顯著。一直到光復之前，施老師覺得鹿港地方相當保守，老一輩的人不穿太過洋化的服裝，差不多一樣年紀人的臺北人，就較鹿港人時髦許多，尤其是到過日本念書的臺北人，穿著就更明顯的洋化。例如她提到：

鄉下農家人與都市人服飾穿著上的差異是很容易分辨，在鹿港鄉下我看到鄉下人都打赤腳，而臺北都會人在街上打

赤腳的情形就比較少見。

日治時期臺北洋化的速度相較於鄉下是快了許多，臺北穿著較時髦，但是一到鄉下就如同到了另一個國度。在鄉下大部分都赤腳，有運動鞋給小孩穿就算很不錯了，有的小孩穿布鞋，有的小孩在家裡穿木屐。

記得小時候外祖母從鹿港來臺北時，鄰居日本人會來拜訪，當看到祖母的小腳時，都很驚訝，好像是見證歷史一樣。在臺北纏腳的人就不多見，但在鹿港纏腳的人就很普遍。

鹿港地方相較於臺北就顯得保守，在鹿港老一輩的人不穿太過洋化的服裝，就以同樣年齡而言，臺北人就較鹿港人時髦許多，尤其是到過日本念書的臺北人，穿著就更明顯的洋化。

至於施老師在看待她的人生時，對於個人穿著態度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施老師對美與穿著態度，都是很有自信，在她成長過程，相當在乎入時、時髦的形象。但戰爭來臨之後，她遠赴日本定居宇部市，人生面臨生活清貧的改變，而這也衝擊到她的穿著，呈現出巨大的轉變。施老師非常仔細描述：

由於我家世不錯，長相討好，再加上受到家族長輩的疼愛，被視為是掌上明珠，所以長大之後穿著打扮都相當講究、入時與體面，加上我在當時能有機會受日本教育，甚至到日本留學，在當時能像我一樣的人可說是鳳毛麟角，之後又能嫁到豪門基隆顏家，所以被視為是人人稱羨讚美的「完美化身與幸運的寵兒」是大家矚目談論的焦點，所以我自己也期望，在每一個場合時刻，都能以最體面的穿著打扮出現在眾人的眼前，以完美的外表來表達我內在的優越感。所以不論是中式旗袍、西式洋裝、日式和服，各種款式我都能接受，只要我有能力一定呈現出最完美的型態。

在二戰之前，生活條件還不錯的時候，我很重視穿著，也愛漂亮與打扮，因此我的穿著都是走在時代的前端。但是到了二戰時戰局開始緊張起來，父親考慮到戰時的安危，決定讓我與夫婿在1942年完成婚禮，而不久我便與新婚的先生遠赴日本，一直待到戰後第二年才回來。戰爭時我待在日本，生活過得很辛苦，宇部市出產煤礦，我白天背著小孩去海邊撿拾煤屑，拿回家當燃料煮東西。戰爭結束前夕，日本國內一片紛亂，當時有軍用服或軍用毯的配給，我就拿毯子做大衣和背小孩的背帶，但沒有鞋子可穿，我只好穿撿回來的農夫鞋。

施老師對服裝的關注與投入有過人之處，她對於服飾的熱情與注重不僅是表現在個人穿著上，也同時顯現在她服飾的專業之中。施老師在戰爭結束之後，從日本返臺，開始從事服飾教育工作，曾開過服裝補習學校，之後並在高中及各大專院校教授服裝製作，甚至被譽為是國內教授服製與服構國寶級的人物；以及是服飾製作教育家，針對她在服飾專業教育養成的關鍵，她提到這都是在1940年她曾至「臺北洋裁研究所」就學，所奠定的良好基石。而且施老師也認為，「臺北洋裁研究所」在教育層面上，的確對臺灣服飾西化有很深的影響。透過施老師的回憶，也讓我們對於日治時期的「臺北洋裁研究所」，有一些瞭解：

在三高女畢業前夕，我考取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赴日為期一年的時間。一年後自日本返國，到臺大附近的「臺北洋裁研究所」（後來改名為「登麗美安」）入學，學習洋裁。「臺北洋裁研究所」，源自於英國體系，由日本人所創辦，每班約有40 - 50人，每星期上課6個整天，每天7小時的密集課程。課程一開始就以縫紉機製作絲質等布料的內衣，循序漸進、按部就班，從部分縫到完整的一件。另外，製圖打版、帽子飾品、刺繡手工藝等，都有一套嚴格有

系統的教學方式。為期四個月的初級課程之後，有研究科或師範科的課程設計，再加上獲得政府承認，而吸引許多遠從南部慕名而來的學生。「臺北洋裁研究所」紮實的訓練，對臺灣服裝洋裁基礎的教育，可說是貢獻良多。

日治時期「臺北洋裁研究所」，可以說對臺灣人服飾西化教育的發展，有很深的影響。

經由多次與施老師所進行的口述訪談，其過程讓研究者發現施老師對日本有著相當深厚的情感，她還說她的日文比中文好太多、日本為臺灣帶來許多進步的作為。在她人生過程裡，一方面由於來自夫家與日本人關係的特殊，顏家家族有許多日本友人，而且與日本人有非常良好的互動；另一方面就是她不但在臺灣接受日式教育，也到過日本留學，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爆發之後，還與夫婿待在日本，直到光復後才返臺。她也曾津津樂道提及，在1940年她獲得殊榮，成為青年愛國團體「桔梗俱樂部會員」的成員之一，並且還在臺灣總督官邸前，與長谷川總督伉儷合照。這些種種的經歷都塑造出她特有的價值觀。對於這種濃厚的日本情節，施老師也承認，其確實深深影響她個人穿著的行為與模式，這正是造成她穿著價值思維的根源所在。施老師曾有相關的陳述：

日本德川時代的300年之間，天下太平，保有日本獨特的文化，在衣服上、生活上有燦爛的歷史，日本中原的衣服變成和服，日本統治臺灣時，在同化臺灣人的政策之下，將日本和服製作技術教給我們。很小的時候，我就能感受日本和服，款式很典雅能讓女性展現特有的美感。

明治28年，臺灣成為日本統治版圖，派北白川親王到臺灣，後來親王病死於臺南，然後以臺灣神社奉祀，這位親王有許多優秀的子孫（他的外孫女曾與我同班）。明治天皇在許多和歌詩中表現對臺灣的關懷，派了不少一流人才來統治臺灣，乃木希典就是其中之一，我六年級時，在三口縣下關

參觀乃木希典的遺跡，感慨良多，乃木希典在做臺灣總督時，對臺灣人的穿著沒有給壓力，也沒有要求馬上一定要改變。歷任的總督在教育方面，地政戶政都有一貫的建設與整理，為臺灣帶來進步。

明治是實行洋化的天皇，德川禁止出國（出國者是要被捉去坐牢的）。明治制定洋服做大禮服，皇族階級的各層都制定有各種不同的西式禮服，學校制服也是這時代所制定的，一百多年來很多學校尚維持這種款式，例如伊敦學校，教育制度也是全國性的，日本統治臺灣也是照其制度來實施。臺灣教育的普遍相信日本的治理是功不可沒。

日本來臺灣之後，對臺灣的惡習就有改革之意，像我母親是民國6年出生，她就已不纏腳。這也日本人對臺灣的一大德政。

我到臺北讀小學一年級時，每天可以聽日本歌唱片，那是用手捲撥條的方式，要換針，我都學會。這些都是洋化的物品，是從日本運來，為的是提高臺灣生活水準。

## 二、學生制服

在1915年之後，臺灣子弟上學穿著中式款式服飾的情形，開始有了顯著的轉變。其起因是由於在1915年，臺灣總督府於臺中設立了第一所公立中學校，學校規定學生舉凡衣食住行皆採日式，故該校學生依據日本制度，制訂男學生制服款式，即「日式西化的制服」（例如，立領、西式鈕釦）。至於在1910年代的女子中學的女學生，則仍著平日所穿的中式服飾（不過在1910年代後期，女生裙子款式為「西式裙」；著西式皮鞋，故應為中西合併）。緊接到了1920年代，日本殖民臺灣的政策也從「綏撫」轉為「同化」，為落實這種政策的轉變，特別以教育作為轉變的主力，也因此臺灣總督府於是在1922年2月6日正式修正〈臺灣教育令〉，除了普通學校、公學校之外，所有學校依據日本內地學制實施（遠流臺灣館，2001：15）。並且在1922年4月1日，

特別以敕令第二十號，頒布〈臺灣教育令〉，開始實施「日臺共學制」（遠流臺灣館，2001：15），即是廢除臺灣學生與日本學生的差別教育（除初等教育外，與日本內地制度無大差異。中等以上學校，在原則上全部為共學制度）。自此開始，不但確立了臺灣教育的根本方針，也統一了臺灣的學制。當然，就在此基礎之下，全體學生的制服模式也因而形成。換言之，在臺灣學生制服方面，不論是衣服、鞋子、帽子、書包等都有一定的式樣，並且以日本為本，而全面一改之前以「臺灣服」為學生制服的情形。

受到教育同化的影響，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之後，公學校的男生全面開始著「日式西化」的學生服。中學校女生也從1920年代全面開始穿著「日式西化」的學生服。這些制服的「日式西化」說穿了，就是日本殖民政府，希望透過日式教育，使得臺灣年輕學子「同化」成為日本人，即藉由教育方式欲圖達到，建立起大和文化意識的新世代子民。

針對日治時期學生制服的發展與現象，施老師個人也特別一再強調，根據她個人實際親身穿著的經歷，以及從周邊親人所穿著情形的瞭解，她覺得在所有服裝類別中，「學生制服」這個項目，對臺灣服飾的發展影響最為深遠而且直接。因此，她對於「學生制服」有相當多的陳述。她相當清楚描述日治時期有關學生制服的一些資訊：

日治時期公學校女學生制服是以「白襯衫；藍背心裙」為主要代表。女生穿著、儀態、外型一切都是以日式審美價值為基準。

我在讀臺北蓬萊公學校二年級的時候，學校開始制訂制服。蓬萊公學校制服可以自己製作也可以在特約店訂製，「行成行號」是當時最具規模的制服特約店。每一所學校的制服都不同，蓬萊公學校女生的制服是白襯衫、中腰位置有剪接線的藏青色背心裙，配上白色長襪、戴著白色帽子，鞋子為娃娃鞋造型，河童髮型。一切外型都是以日式審美價值為基準。

我記得小時候有同學留長髮而被老師禁止的例子。同樣

的，在日治時期，女學生在學校耳環也被禁止。男女生都要穿制服和戴帽子上學。

我就讀三高女時，一、二年級可以剪髮，而三年級以上是兩支掃帚在耳邊。每年都會在4或5月的時候舉辦一次遠足活動，秋天時會舉辦登山活動。參加這些戶外活動時，穿著制服、穿寬鬆的燈籠褲、白色棉長襪、戴帽子。

在日治時代公學校方面學生制服的材質以棉質為主，很多學校制服的材質是以緞紗織的叫做「霜降」（日語）之棉布製作，男生制服以「日式西化款式」為標準，這不同於之前學生所穿著的「中式臺灣衫」。日式制服上衣為翻領、對襟釦、五顆釦。男學生從小學到大學上衣，一律是單排五顆釦，大學有的釦子是以校徽做成的金色釦子。男生穿長至膝蓋的褲子。

日治時期臺灣人讀的叫「公學校」，日本人讀的則叫「小學」。「公學校」與「小學」的制服一般來說並無差異，不過日本人所讀的樺山小學就很有特色，他們的制服如同童子軍服。

在日治時期幼稚園沒有制服，但一定要穿圍兜，圍兜式樣有一定規定，不過較為自由。

中等學校男生衣服的領型是立領，立領內層有白色護領可換洗，「霜降」布；褲子為長褲；穿皮鞋。女學生制服的水兵領上衣，為日治時期女中制服款式的代表。不過在不同地區的中等學校女學生制服，其款式差異相當大。至於職業學校有所謂的實習課程，是必須穿著實習衣服，在作業褲小腿處有一排的釦子可解開，腳上穿著所謂的足袋。

男生從公學校到高中畢業之前都要剃光頭，高中生上課時一定要綁腿才算服裝整齊。

施老師認為日本人對教育很有一套辦法，非常重視生活教育，每個細節都規定得很仔細，從要求學生穿著鞋子一事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做事

的態度，是講究謹慎與重視規範的，而透過這些學校教育的養成，培養出同學正確的價值觀，例如過去臺灣人隨隨便便的態度，但在接受日本教育之後，隨便的態度有了明顯的改變，守法的精神也有了大幅提升。她特別以所就讀的三高女為例說道：

在我讀三高女時每個人有三雙鞋子：一雙皮鞋是上學途中穿用，一雙白色鞋子是上課時候在教室穿用，一雙黑色鞋子為外出的工作鞋，讓學生養成在不同的場合就該有不同場合的穿著。這個作為就是執政的人，希望透過教育的方式來培養國民的素質，也就是藉由穿著規範的遵守與學習建立價值。

戰爭時期遭逢生活條件的改變，同樣對學生制服也帶來一些影響，尤其是在學生制服規範與款式上，也出現因應的改變，親身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施老師，對於學生制服的改變情形，做了詳細的說明，她的說明也讓我們對戰爭時期制服的現象有了更明確的瞭解：

在1930年末，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學生制服有了些變化。戰爭時期日本當局為了顧及學生躲空襲的安全，規定衣服布料的顏色改為「國防色」（草綠色），並且在衣服上縫有「名條」，就是在上衣左胸有名牌，以辨識身分及節省救助的時間。上課平時戴「大盤帽」，但遇有軍訓課時另有一軟帽（又稱「戰鬥帽」）。另外，為了躲空襲之便利，特別針對女學生的制服，規定每一個人要有一條「工作褲」，「工作褲」的樣式，由學校統一發樣式圖自行製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一切從簡，學生制服只有一套。書包採自由放任無規定，雙肩書包或袱巾都可以。這個階段由於限於物質缺乏，學校對學生規定較鬆懈；衣服破了沒關係，補起來就好，只要符合整潔、清潔即可。

施老師不斷的提到，在學校教育中，穿著制服對學生個人建立起服飾

審美的概念，可以說是最直接的一種方式，因為每一位學生，從每天穿著制服中學習共同價值的自我意識，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透過穿著的學習讓學生很自然的培養出一種審美價值，此充分顯示出日本殖民政府，透過政治力達到服飾計畫性變遷的一項最具有代表性之例證。所以她認：

每個執政當局都希望透過學生制服來建立出一套標準，以達國民意識的穩固。這就是為什麼，我看到也感受到，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相當重視學生制服。應該是希望藉制服來改造臺灣民眾，讓臺灣民眾經由穿著制服來認同日本政府。除此之外，美的價值也同樣經由每天制服的穿著被培養出來。

我在接受日本教育之後，自己覺得改變最大的就是對顏色的看法，其中最具體的改變，那就是比較喜歡淡色，喜歡衣服色彩淡雅簡單，對於臺灣傳統寺廟用極多的色彩，則覺得很俗氣，不知鮮豔的五顏六色到底美在哪裡？

我認為我在選擇衣服時都以清雅淡色為主，這也是與學校教育所帶來的影響有相當程度的關連。

另外，施老師還特別提到，除了穿著學生制服對個人建立服飾審美影響很深，學校教育授課內容對服飾審美影響也一樣很深，尤其是從日治時期女生在中學都要學洋裁，在三高女畢業時按規定還要做一件和服。施老師就特別提到：

在我中學時課程包括了洋裁課，透過課程學習讓我對西式洋服有更深入的了解，這也使得我對西式服的接受度超過中式服。更加喜歡西式洋裝的美感。

在我就讀三高女時，畢業前還要做一件和服，當作是畢業的禮服，而當時還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940年代，我個人認為這是日本政府，想藉由穿著來讓臺灣年輕人建立日本意識，讓臺灣人自然轉變成為日本子民的方式。說真的，

這對我的國家認同與信仰觀念確造成相當大的影響，甚至產生矛盾。

## 伍、結論

一、以生命史的口述歷史作為研究方式，確實能為臺灣服裝史相關議題的研究，開拓出新的研究方向。

本次以施老師個人的生命史為核心，並藉由口述歷史方式進行深度訪談，從施老師口述中，不僅驗證過往一些臺灣服飾歷史與文化，也發掘出一些異於過往的想法，相當程度忠實的被呈現出來。另外，經由本次研究的進行，也為臺灣服飾歷史與文化，彌補一些過往未曾提及之處，並且修正過去一些以偏蓋全的問題。

本次研究讓受訪者施老師充分表達自我，就以她個人以及親人為例，以自白的方式，敘說她與親人於日治時期穿著的現象，透過研究者的引導，施老師不僅就穿著的外觀現象進行清楚表達，甚至更進一步，對穿著現象的內心層面進行剖析，探究出現象背後的意涵與態度之所在，而這些珍貴的內容，確實有效彌補過往，單一以文獻資料作為研究方法的缺憾。

藉由本次以生命史為核心的研究，不但讓研究者充分地分享施老師個人的人生經驗，使得學術研究更具人性化，另也從中獲得更多個別式的訊息與看法，此乃有助於深究服飾現象背後真正因素的掌握，讓我們看到事情之間的因果關係，是相當值得作為日後臺灣服飾研究的一種方法。

二、藉由本次施素筠所提供的口述及家族珍藏的傳世照片，能呈現出日治時期，鹿港施家與基隆顏家家族成員服飾穿著的現象與意涵之所在。

經由本次研究，分別呈現出鹿港施家成員（其包括鹿港施家女性成

員、施老師母親陳月嬌、施老師父親施安及伯父等人），他們在服飾穿著上的現象與意涵之所在。對於施家，施老師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相當保守，而這種保守的觀念，也著實反應在鹿港家族年長成員的生活中，尤其是加重在女性成員身上，穿著除了「講求保守」之外，「為了美觀」與「重視面子」，也同時是穿著考量的重要因素。施老師母親的保守拘謹個性，養成一生嚴守女性規範的價值觀，加上對於中華文化有相當大的熱情，所以她最常穿著的還是中式服（特別是旗袍），髮型式樣也是一層不變。至於施老師父親，雖然出生於保守拘謹的大家庭裡，但他出生時父母親都年長，故深受寵愛，加上其個性使然，中學時又離鄉背景到臺北就讀書，少了家人的約束，所以讓他處處表現出講究時髦的穿著打扮，這也相當有別於兩位兄長的穿著態度，形成壁壘分明強烈的差異。

經由本次研究，分別呈現出基隆顏家成員服飾穿著的現象與意涵，其主要對象除了顏雲年、顏國年之外，男性成員還包括顏滄海與顏滄濤，至於女性成員，則有顏梅、顏張女英、顏碧霞等人。其中就顏雲年部分，曾有史料文獻記載有關顏雲年對「斷髮剪辮、解放纏足」一事的看法，透過施老師的轉述，也讓我們能經由該家族的角度，以不同的面向去理解顏雲年的心態與想法，掌握到一些現象背後的涵意。另就顏國年部分，透過施老師的轉述，讓我們了解顏國年他剪辮的原由；他個人穿著從中西合璧到全盤西化的變化；接受日式穿著的情形；以及對西式服穿著上特有的品味的真實。從本次研究也讓我們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顏家女眷經常透過與日本友人的聚會，穿著十分華麗的日式和服，這種現象的目的，是為了藉由穿著讓日本友人感受到顏家對日本人的支持，建立良好的友誼，這在當時是相當特殊的。

三、藉由本次施素筠所提供的口述及家族珍藏的傳世照片，能深入瞭解施素筠老師個人，在一般穿著與學生制服的穿著現象、態度、價值與看法。

施老師在看待她的人生時，對於個人穿著態度而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施老師對美的追求與穿著態度，都是很有自信，在她成長過

程，相當在乎入時、時髦的形象。但戰爭來臨之後，她遠赴日本定居宇部市，人生面臨生活清貧的改變，而這也衝擊到她的穿著，呈現出巨大的轉變。

經由多次與施老師所進行的口述訪談，其過程讓研究者發現施老師對日本有著相當深厚的情感，她還說她的日本比中文好太多、日本為臺灣帶來許多進步的作為。在她人生過程裡，一方面由於來自夫家與日本人關係的特殊，顏家家族有許多日本友人，而且與日本人有非常良好的互動；另一方面就是施老師她不但在臺灣接受日式教育，也到過日本留學，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爆發之後，還與夫婿定居在日本，直到光復後才返臺。她也曾津津樂道提及，在1940年她獲得殊榮，成為青年愛國團體「桔梗俱樂部會員」的成員之一，並且還在臺灣總督官邸前，與長谷川總督伉儷合照。這些種種的經歷都塑造出她獨特的價值觀。對於這種濃厚的日本情節，施老師也承認，其確實深深影響她個人穿著的行為與模式，這正是造成她穿著價值思維的根源所在。

針對日治時期學生制服的發展與現象，施老師個人也特別一再強調，根據她個人實際親身穿著的經歷，以及從周邊親人所穿著情形的瞭解，她覺得在所有服裝類別中，「學生制服」這個項目，對臺灣服飾發展的影響最為深遠而且直接。因此，她對於「學生制服」有相當多的陳述。施老師不斷的提到，在學校教育中，穿著制服對學生個人建立起服飾審美的概念，可以說是最直接的一種方式，因為每一位學生，從每天穿著制服中學習共同的價值，而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讓學生很自然培養出一種審美價值，這也正是日本殖民政府，透過政治力達到服飾計畫性變遷最有利的一項代表。



圖1 1922年施素筠老師鹿港祖厝全家照。後右一為施安（施素筠老師父親），右二為施富（二伯），右三為施時（大伯），後排左一、二位為大姑之子女，中排右一為施陳月嬌（施素筠老師母親），右二為施黃過（二伯母），右三為施陳賢（大伯母），中間為祖母施林引，左一為四姑，左二為三姑，左三為大姑，前排左一為大姐施連治，前排左二為梁素月（大姑的女兒），前排左三為三姊施水定，前右一為大兄施心田，右二為二兄施秋山，三兄施焜山。除施素筠老師父親穿著西式服之外，其餘都是穿中式服。（照片由施素筠老師提供）



圖2 1923年顏國年先生的全家福。右三為顏國年，左三為顏國年夫人，右一為顏滄濤（長子），右四為顏滄波（二子），左一為顏梅（長女），左二為顏滄濤（三子；施素筠老師的先生），後排左一為顏碧霞（次女）。顏國年著西式服，男孩著學生制服，顏國年先生的夫人身穿中式服，但未纏足穿西式皮鞋。（照片由施素筠老師提供）

圖3 1927年在鹿港時期的施素筠老師，穿著中式襦袍與西式皮鞋。（照片由施素筠老師提供）



圖4 1932年在台北時期的施素筠老師，穿不對稱的領形洋裝，服裝式樣是來自日本服裝雜誌。（照片由施素筠老師提供）



圖5 1937年中學時的施素筠老師，穿著夏季學生制服。（照片由施素筠老師提供）





圖6 1939年在日本留學時期的施素筠老師，她與日本同學的合影。施素筠老師穿著洋裝，其餘日本同學則穿和服。（照片由施素筠老師提供）



圖7 1940年時的施素筠老師，穿著夏日式和服。（照片由施素筠老師提供）



圖8 1941年施素筠老師在「台北洋裁研究所」（登麗美安），穿著自己做的制服。（照片由施素筠老師提供）



圖9 1941年施素筠老師與母親。施素筠老師穿著洋裝，母親則穿著絲質中式旗袍。（照片由施素筠老師提供）



圖10 2000年施素筠老師接受本研究的深度訪談。

日治時期顏、施兩家服飾特徵及其意涵：以施素筠的生命史為例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唐 羽（2003），基隆顏家發展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許雪姬（2004），臺灣口述歷史的回顧與展望（抽印本），華人社會口述歷史工作研討會。

許雪姬（2005），臺灣口述歷史的回顧與展望，宜蘭文獻，第71-72合期，頁3-37。

葉立誠（2001），臺灣服裝史，臺北：商鼎。

遠流臺灣館（2001），臺灣歷史年表，臺北：遠流。

### 二、英文部分

Becker, H.S. (1970) . The Life History and the Scientific Mosaic. in Becker, H.S. .

Sociological Work: Method and Substance (pp.63-73) .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Denzin, N. K. (1989) . Interpretive biography. London: Sage.

## 附錄：施素筠老師生命簡史

日 期	事 蹟 紀 錄
1923年9月15日	生於彰化縣鹿港街（鎮）大有口六六三番地。父親施安，母親陳月嬌，身為長女。嬰兒時經常大哭不好帶
1925年	罹患水痘，水痘不慎破裂因此在臉手都留疤痕
1927年	鹿港第一公學校幼稚園入學
1929年	鹿港第一公學校幼稚園畢業
1929年4月	鹿港女子公學校入學
1929年9月	轉學到臺北市蓬萊公學校就讀
1935年3月	蓬萊公學校畢業（以第一名成績畢業）
1935年4月	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子學校入學
1939年3月	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子學校畢業
1939年4月	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保育科入學
1940年3月	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保育科畢業
1940年4月	臺北洋裁研究所（後來改名為『登麗美安』）入學，學習洋裁
1941年3月	臺北洋裁研究所畢業
1942年9月21日	與顏滄濤在臺灣神社前結婚，隨後並緊接遠赴日本，居住在九州山口縣宇部市，先生擔任宇部市興產研究員
1944年5月8日	長子顏雅堂出生
1946年2月28日	與先生自日本返臺，丈夫顏滄濤擔任臺灣工業試驗所技正
1946年9月25日	長女顏翠杏出生
1947年2月17日	長女顏翠杏因肺炎去世
1947年3月25日	到臺北私立靜修女中教書，講授家事、生理衛生課，並擔任童子軍47團團長
1948年1月1日	次女顏珠如出生。先生轉任臺灣大學農化系，擔任副教授
1949年12月4日	次男顏凱堂出生
1951年9月2日	三男顏景堂出生
1953年5月31日	申請洋裁補習班立案
1953年8月	向臺北市政府申請補習班通過，取名「實用縫紉補習班」，後來改名為「瑪莉美拉」。補習班班址位在鄭州路
1959年9月5日	獲聘擔任實踐家政專科學校縫紉專任講師

日治時期顏、施兩家服飾特徵及其意涵：以施素筠的生命史為例

1962年9月	向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提出改聘為兼任教師；擔任榮星幼稚園園長
1963年9月	回任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擔任專任教師；兼任榮星幼稚園義務工作長達33年
1963年	首次擔任第一屆國際技能競賽裁判，並連任20屆，至1983年為止
1964年9月	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家政系兼任教師，教授服裝構成，直至1984年為止
1971年	出版「以西式裁剪看民國二十年以後的旗袍演變」
1971年	次女顏珠如與夫婿王有德在美國結婚
1972年1月	赴美國紐約F.I.T. Tailor Tecnique 進修半年
1972年12月	長男顏雅堂與媳婦張園林在美國結婚
1977年	次男顏凱堂與媳婦金聖子結婚
1978年	出版「袖子的機能研究」
1979年4月	以「旗袍機能化的西式裁剪」一書通過教育部副教授資格
1979年	出版「黏貼襯研究」
1980年7月	赴日本東京發表「旗袍改進」專題
1982年7月	翻譯日本文化服裝講座1~5冊
1982年	三男顏景堂與媳婦李麗珠結婚
1984年	出版編著的「服飾辭典」
1985年	丈夫顏滄濤自臺灣大學退休
1987年	丈夫顏滄濤獲聘為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1988年3月	以「單接縫裁剪」通過美國發明專利
1990年4月	分別以「中國服立體化的應用」和「機能化立體結構之裁剪」獲得國家發明專利
1990年7月	赴日本東京發表「簡易裁剪」專題
1991年	擔任紡研中心顧問，直至1993年為止
1993年7月	擔任實踐設計管理學院專任教師一職退休
1995年12月28日	丈夫顏滄濤（臺大名譽教授）過世，享年80歲
1996年10月	父親施安過世，享年98歲
1996年	開始翻譯「心的基地，母親」、「小孩為主的保育一切」、「倉橋物三全集」三本日文書，並至1998年完成
1998年	以「簡易裁剪服製法」通過中國大陸的發明專利

The Study of the Apparel Phenomenon and Implications of tTwo  
Big Families, the Yan and the Shi,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king Shi Suyun's Life History as an Example

Le-Chang Yeh\*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apparel phenomenon and implication of two big families - the Shi family from Lugang (Ms. Shi's side of family) and the Yen family from Keelung (Ms. Shi's husband's side of family) is derived from the core study of Ms. Shi Suyun. The study of Ms. Shi's life history applied the method and the spirit of oral history. There were more than 74 interviews started from February 1999 to February 2002.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e not only collected valuable information, we also obtained precious family photos provided by Ms. Shi. With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and the help of Ms. Shi, the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use multiple cross-matching methods to precisely verify the time, background, characters and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The study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motive and purpose. There are three concrete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First, the researchers attempted a study of Taiwan's fashion history and culture through an oral history of Ms. Shi's personal life. It developed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for this kind of study. Second, through Ms. Shi's narration of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together with her many pictures and in addition to the researchers' verification, it presented a lively picture of two families, the Yan and the Shi, wearing costum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of Taiwan. Furthermore, it explored the meaning behind the apparel phenomenon.

Third, the researchers attempted to use Ms. Shi's personal life history as the core study and by way of taking her as an example to understand more

日治時期顏、施兩家服飾特徵及其意涵：以施素筠的生命史為例

---

\* Shin Chien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 Publishing Director

about her personal views of the apparel phenomenon, attitudes and values on general apparel and students' uniforms, it was substantial in setting up a new thinking for a deepened study of Taiwan's fashion.

Keywords :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Yan Family from Keelung, The Shi Family from Lugang, Life History Research, Oral History, Taiwanese Costume